

现代日常生活的诞生

—以昭和37年度厚生白皮书为中心—

IWAMOTO Michiya
岩本通弥

翻译：施尧

序——问题的所在

本文以现代民俗学的立场，主要从都市生活变化的角度来对“高度经济成长期”做一份汇报，目的是要把握与当今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日常”的形成过程。

在新开放的历史民俗学博物馆的现代展示厅中有一个重点展示，在第六展示室的一隅，陈列着对昭和37年（1962年）开始入住的东京北区赤羽台团地^①生活的再现展示。本文也兼对这个展示的设置缘由做一个扼要的说明。高度经济成长期中的都市生活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各自经历过，是一些“被熟知的不言而喻的”内容。要如何用民俗学的方法来展现这些内容？对于那些让人们觉得“说起来确实如此”的诸多事象，我们不是把它们作为激发怀旧情绪的工具和装置¹，而是要观察与当今生活紧密联系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形成的。²让大众对于这些不言而喻的事物重新认识和定位，便是本文（以及这个展示）的主要着眼点。

1. 现代生活的日常化过程和分析视角

首先，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现代民俗学。1970年代之后，以德国为中心，民俗学(Volkskunde)被定义为一门“分析由客体以及主体表现出的文化价值的转移、其成因以及具体过程”³的科学，民俗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客体和主体指的是：文化的价值观既以物或规范的形式“客观地表现出来”，又以态度或见解的形式，通过“讲述(narrative)”等“主观地表现出来”。民俗学把对这两者的辨析作为研究手段，目的是要对价值（知识以及信息、价值观）的“传达”过程作深入的梳理和分析。由此，区分客观的历史(Geschichte)和主观的历史(Historie)，同时追问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充分发挥民俗学特长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例如，高度经济成长期开始于昭和30年代，随着昭和30代的热潮，被广泛流传和相信的“家庭”观，一般来说可以总结如下：

近年来，凄惨残忍的杀子弑亲或虐待儿童的案件在增加，似乎“家庭的崩溃”已经到了极致。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说“以前可没有这么残忍的父母”。昭和30年代以前日本的普通家庭的印象是全家人围绕在矮餐桌边其乐融融地吃饭，可是这些（日本历史悠久的“传统”），却因高度经济成长而崩溃了。

然而，这样的说法或印象是极其主观的认识，据统计，实际上无论是杀子还是弑亲在昭和30年代达到顶峰后便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这些认识和客观事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⁴在现代民俗学中，我们不是如同昭和30年代的热潮一样，对过去进行怀旧式的美化，而是通过精确地追踪调查我们生活的变化（客观的历史），反过来考察这些主观的历史认识（比如身体感

受到的不安等）是如何被述说得具有现实感的。这个权威化（言论化）的过程以及意义赋予的变化，我们可以采用对故事、传说等的“生成分析”相同的手法而提取出来。

基于这个观点，我们发现事实上“厚生白皮书”^②也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所谓“白皮书”，是在基于统计的现状分析上，对国家和各省厅^③的政策方针（施政的依据）进行言论化的文件。它如何把握和认识现实？预想要设立什么样的指标？分析这些问题，我们便可以看出政策的权威化的过程。而这往往和客观的历史是存在偏差的。描述一般老百姓“生活”的“白皮书”，除了厚生省的“厚生白皮书”，还有经济企划厅的“国民生活白皮书”。通过对比这两份资料，便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我们生活情况的实际变化，与此同时，各省厅的主张（施政倾向）也将浮出水面。

比较各年度“厚生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卷首“总论”的内容，可以看出其论点（当时的政策性课题）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时期：昭和 33 年（1958）年以前，白皮书的中心课题都是贫困问题。到昭和 34-46 年（1957-1971）期间，主题转变为随着高度经济成长，由人口结构的变动引发的诸问题（主要是福利保险和健康问题）。进入昭和 47-63 年（1972-1988）后，则是高龄化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养老金问题为主）。最后在平成元年-20 年（1989-2008），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针对少子化问题的对策则成为焦点（其中，“真正的富裕”、“家庭”、“儿童”、“抚养”、“医疗”、“地方”等成为关键词）。

本文将重点关注昭和 37 年（1962）版的白皮书。这一年的白皮书在总论中高度评价“人口资质的提高”，其基本构成是在“日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认识的基础上，预测因急速的都市化进程可能引发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并对未来进行展望。这里面呈现了很多沿用至今的政策（比如国民养老金等）在具体成形期的状况，现在回过头来看也颇具深意。⁵ 在东京迎接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际，东京或都市居民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分析白皮书，我们可以认为 1962 年（昭和 37）便是这个时代的转折点。基于这个判断，从民俗学的角度将“生活”作为观察的立足点出发，便有了上文提到有关赤羽台团地的再现展示。

2. 高度经济成长期的家庭变动——少子化问题的政治性

对于都市居民家庭生活的核心变化，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切入，那就是当今正成为社会问题的少子化现象，常见的是类似图 1 的表述。这里所说的“出生率”指的是“总和生育率”，是把 15 岁到 49 岁的女性按照年龄别将其生育率相加得到的结果。表示的是假设一个妇女在整个育龄期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她所生育孩子的总数。这张图给人一种错觉和不安，似乎按此情况继续下去，日本人就将要灭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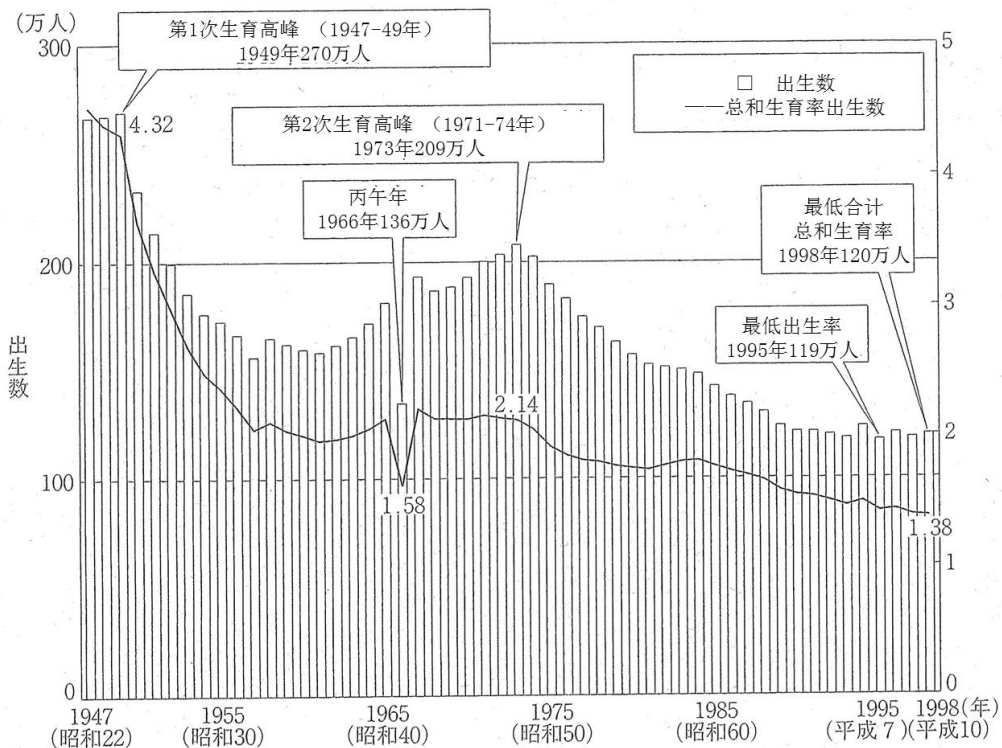


图1 出生数以及合计生育率的演变

(资料) 厚生省大臣官房统计情报部“人口动态统计”

(出处) 平成12年版《厚生白皮书》

另一方面,图2显示了出生年次别的平均兄弟姐妹数的比例。从其演变来看,1935-1939年(昭和10-14)出生的一代4.59人是最高峰。1965年(昭和40)以后出生的有两个兄弟姐妹的人超过了半数。持续15-19年婚期的夫妇的生育儿数(最终生育儿数)在1972年(昭和47)之后只在2.1到2.2之间波动,可见婚后夫妇的生育行为没有太大的变化,正如社会学者用“二子革命”⁶来命名这个现象一样,现在生两个孩子已经成为一种标准了(惯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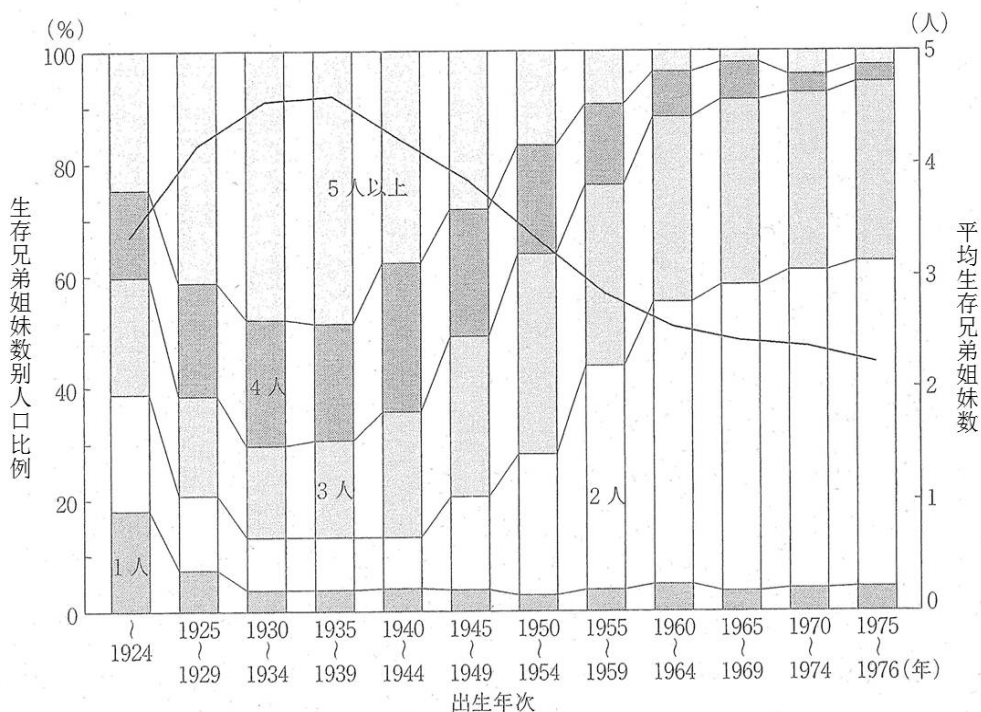


图2 出生年次别兄弟姐妹别比例以及平均兄弟姐妹数

（资料）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第3次户籍动态调查”（1994年）

（出处）平成8年版《厚生白皮书》

图1显示出的少子化现象，其主要原因被认为是未婚和晚婚的影响。而我们民俗学者或社会人类学者更为关注的是，图2所示的1924年（大正13）以前的兄弟姐妹数。生存的兄弟姐妹数是一人、两人、三人的比较多，总计三人及以下的占到了六成，孩子数量、以及家庭成员的构成和今天没有太大的区别。相比之下1925年-1945年（大正14-昭和20）的4人或5人以上兄弟姐妹的比例反而显得异常之高。实际上，这是因为在1927年，政府成立了它的咨询机构“粮食问题调查会”，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有关人口统管政策的讨论，人口政策也开始转变为增长政策。特别是1940年（昭和45）起，面向总力战的“产儿报国”，打出了“多生孩子多繁衍”的口号，时代的影响很大⁷，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特有的现象。

因此，图1所展现出的总和生育率的骤减倾向，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一代人生五人以上的多产夫妇的减少。然而图1却并没有标出战前的数据，这便有问题。图3是包含战前数据的人口出生率（CBR）和总和生育率（TFR）的长期演变图。由此可见图1的绘制起点恰是日本有史以来出生率极高的特殊的一代（稠密的一代）的生育高峰（战争结束后，出生率激增是世界性的一般规律），如此制图，也难怪不了解统计方法和实情的一般民众会产生之前所说的那种错觉和不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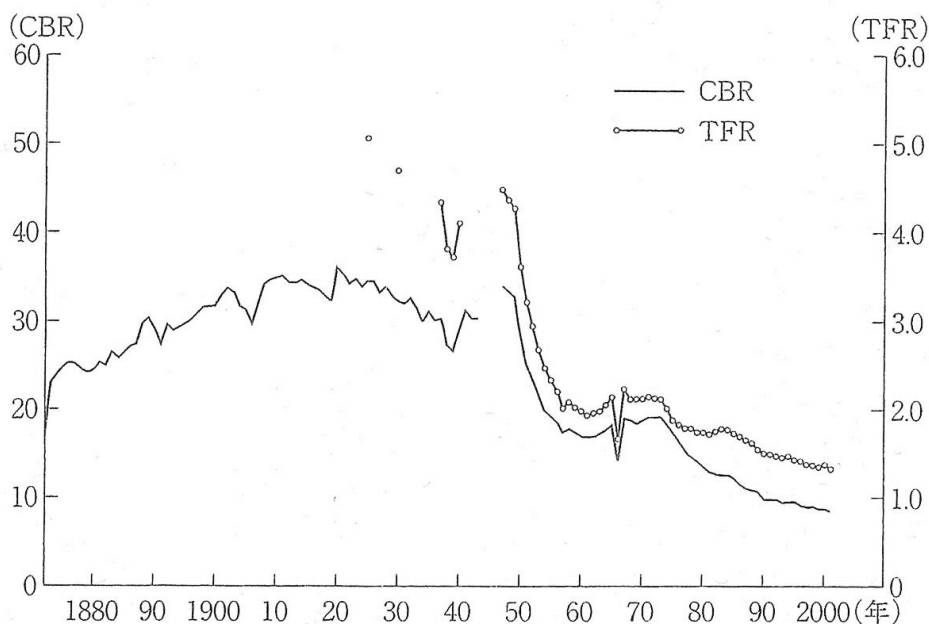


图3 出生率的长期演变——人口出生率（CBR）和总和生育率（TFR）

（资料）1873-90年：内阁统计局《日本帝国统计年鉴》1900年后：

厚生省大臣官房统计情报部“人口动态统计”

（出处）落合惠美子 『21世紀家族へ』（第3版，2004年）

对此，欧美的人类学者和人口学者们有一个共通的看法，如图2的1924年（大正13）以前的兄弟姐妹人数数据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日本的粗出生率（1000人相当的出生率）从近世以来就已经“低到无法想象”。⁸很多学者将研究的焦点对准为何相比其他农业国家日本的出生率如此之低，近世期的日本何以能够保持人口在一定的规模。比如，剑桥学派的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等没有一味如同既有的研究一样过分强调扼杀婴儿或堕胎的影响，而是从家庭层面的人口调整体系（受孕间隔、哺乳期间、卫生状况等以及人们对此的意识）进行了分析和考察。⁹因此甚至可以说，在欧美学者看来，少子化社会才符合日本文化的体系。¹⁰

事实上，国家在白皮书中开始使用“总和生育率”（TFR）这一考虑了年龄构成差异（即人口金字塔）并适用于国际比较的数值，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它最早出现在昭和49年（1974）版，频的白皮书中，繁地出现则是在平成元年（1989）之后。在此之前说到出生率，一般指的是“人口出生率”（CBR）。图1出自平成4年（1992）年版白皮书，实际上，在平成4年版里，还有图4这样的展望将来的图。从这张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即便对现今政府热议的少子化对策不做任何应对，总和生育率这个数值也会按照人口学的规律演变，其结果绝不是一味地下降直到变成零为止。这种煽起公众不安的言论，不过是文化国家主义的“消亡言论”。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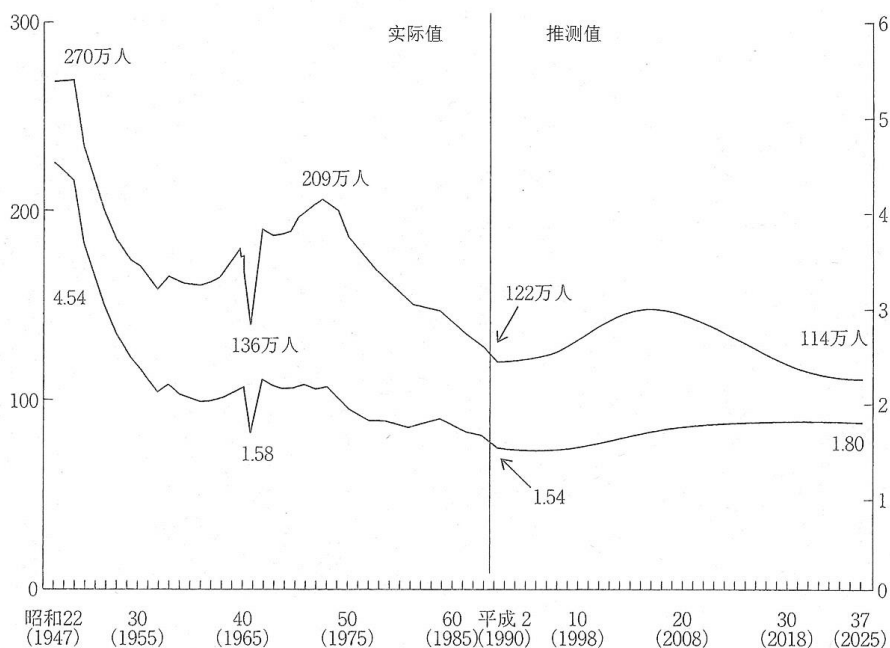


图4 出生数与总和生育率的演变以及未来推测（中位推测）

（资料）实际值是厚生省大臣官房统计情报部“人口动态统计”

推测值是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将来预计人口（平成4年9月推测）”

（出处）平成4年版《厚生白皮书》

在日本，社会开始正视少子化问题源自于1990年（平成2），当年的总和生育率跌至比前一个丙午年^④1966年（昭和41）的1.58还低，人们称之为“1.57震惊”，同时媒体的大肆宣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白皮书长期地把低出生率与以养老金制度为主的高龄人抚养负担增加问题联系在一起描述。在此之前，白皮书对于少子化不一定是负面的评价。事实上，战后不久，尽力普及“家庭计划（避孕法）”的也正是厚生省。直到1980年都是与世界性的人口爆发相联系起来说明的（尽管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了对将来的劳动力不足的指摘），可以看出在当时反而少子化才是被认为比较理想的情况。有关点的一个典型是昭和48年（1973）版中对儿童补贴一项的记述。在第二次生子高峰，生第三子受补助人数的大量增加被白皮书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因而当今对于少子化的议题设定，能明显能感受到其中造作的成分。其根底上与战争时期将出生率减少的倾向看成是“导致日本民族凋落、衰老的心腹大患”¹²的畏惧相同，可以认为这里面隐藏着民族主义（自民族中心主义）的思考方式，详细的分析还有待日后进一步深入。再者，随着高度经济成长期进入尾声，低成长导致的社会保障的困境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管怎样，可以说这是一个“创造出来的权威话语”。

3. 高度经济成长和家庭的“容器”——模式化的集合住宅的生活方式

图2本意只是标示生存兄弟姐妹的数量，但事实上，它还反映出了从多产多死型，到多产少死型，再到少产少死型方向转变的过程。与此同时，从这张图上，还可以发现高度经济成长期人口向大都市的移动现象，也是1925年—1945年（大正14—昭和20）的多产少死型生育下产生的农村剩余人口所引起的现象。

在高度经济成长期之前，即便日本的总人口有所增加，但如图5所示，明治末年以后，其农业人口就基本维持在一定的数值上。随着机械化和化学肥料、农药的普及，战后日本农业向着省力化、兼业化的方向发展。农村剩余人口从战前的进驻殖民地，变为大量涌向了大都市。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市人口都在增加，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高度经济成长期的增长曲线尤其陡峭。和在工业革命后缓缓变化的欧美国家不同，日本期望于急剧地对产业结构进行转变。高度经济成长期前的家庭规模（平均同居人员），如图6所示几乎是保持一定的。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后它急速地减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口向大都市集中后导致的都市劳动家庭的增加。因此论述家庭的时候，不应该只是平面化地理解，而应该把集中涌向大都市并集团性就职的一代人的特殊性（都市人口、农村人口比例的结构大转换）考虑在内¹³，进行立体地、多层次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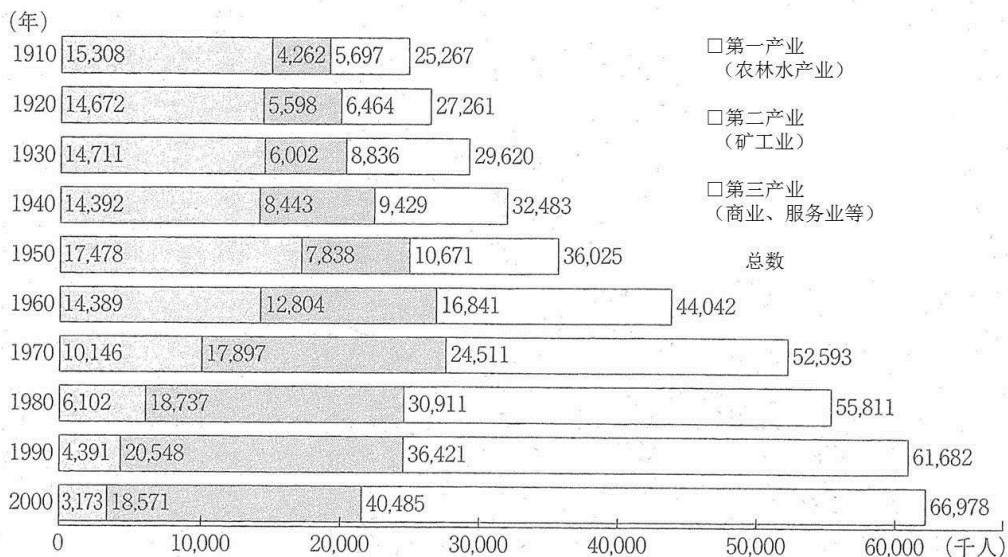


图5 产业别就业者数的演变

（备注）1920年以后的总数（最右的数值），包括不能分类的产业。

（出处）1920年以后是《人口普查》，1910年度据大川《劳动力（长期经济统计2）》推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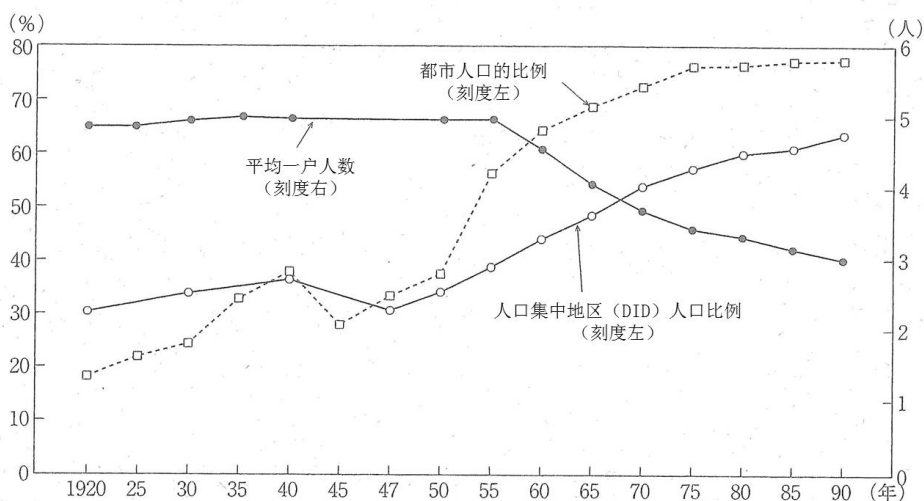


图6 都市化进程与平均每户人数的演变

（备注）1 总务厅《日本帝国统计年鉴》，同《人口普查》，

DID人口比例的1920年-55年是根据大友笃《日本都市人口分布论》而制作。

2 都市部人口比例的45年-47年，DID人口比例的60年-65年不包括冲绳岛。

（出处）平成7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

作为接纳这种新型都市移居者的“容器”，1955年（昭和30）成立的日本住宅公团（现在的UR都市再生机构）等建设了大型公团以及公营的住宅团地。尽管1970年代以后，民间开发商的公寓建设也有所进展，然而日本住宅公团在东京23区内最早大规模开发的团地，便是位于北区的赤羽台团地，它从1959年（昭和34）开始建设，到1962年（昭和37）年开始入住。包括面向单身的1K户型到面向家庭的4DK户型共有3373户，被称为“巨型团地”。在其广大的用地内，除了有三所中小学校、公园等共同空间，还设有团地内的商店街。这些充实的生活设施，在昭和30年代，作为走在时代最前列的集集团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现代日本人的住居方式，在不停地往高层集合住宅方向发展，其住户数也不断地增加，如今东京都内已有超过七成的人居住在集合住宅内了。¹⁴实际上，当今住独门独院的人已然成了少数，而我们对于这点却毫不知情。

战后，日本的住宅不足问题曾经很严重。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战祸引起的房屋烧毁和从外地涌入的难民，总共有420万户的住宅不足缺口。而到1955年的“住宅情况调查”显示约有270万户缺口，1958年（昭和33）也仍有216万户缺口，缺口问题并没有得太大的改善。即便到了1960年（昭和35），据推算大中城市仍有约185万户的住宅不足。劳动世代的39%是住房贫困者。很多即便月收入较高的人，也还是和全家人一起生活在租来的单间房内，属住宅贫困户。¹⁵“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张从1961年（昭和36）到1970年（昭和45）之间需建设1000万户的住宅。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7月，鸠山一郎内阁打出建设42万户的住宅的口号，由此建立起来的正是日本住宅公团。¹⁶

战后日本推行住宅政策中，日本住宅公团采用2DK、3DK这种“nDK式”的户型，是使

家庭规模和房间布局相一致的住宅供给手法¹⁷（ n 是指夫妇和 $(n-1)$ 个孩子所构成的家庭容器）。这里设定的是年轻的劳动家庭（工薪家庭），这种“容器”也渐渐规定了家庭的样式。没有婆媳之间的纠葛，仅由夫妇和未婚子女构成的原子家庭中展开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一种标准，并且这种生活及理念，也波及到了地方的生活。随着大众媒体文化传播的介入，可以满足原子家庭私生活所必要的最低条件的住宅这种不用顾虑他人或亲戚，仅由夫妇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可以维持私密的空间以及这种家庭理念、家庭规范开始向全国渗透。以前电视上的家庭剧，如《七个孙子》、《现在 11 人》（都是 1964 年），描绘大家族（大规模的同居人员）的情况比较多。相比起来，现在的电视剧，尽管也有像是《世间都是鬼》这样的例外，和过去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¹⁸ 战后废除了传统的家族制度^⑨后，民法在家庭法中所追求家庭理念和理想，可以说随着集合住宅的展开，总算被实现了。

近年单间户型的急速增多，直接反映出独自生活的单身户的激增，但是另一方面，原子家庭率几乎保持在一定的数值上（学术上的核心家庭是指夫妇和未婚子女构成的家庭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原子家庭化了”这种说法，是一种包含着理念的通俗用法（通俗用法的“原子家庭化”在学术上指每户家庭的小规模化）。确实三代同堂的家庭形态（扩大家庭）正在减少，但在 2005 年（平成 7）的人口普查中显示仍有超过 2300 万人过着这种生活，比独自生活的 1450 万人要高得多。三代同堂的家庭等，在欧美，特别是安格鲁萨克逊系统的国家里早就已经看不到了，如果不考虑到这种文化的限制性，对于生活实情和家庭特征的把握便会出现偏差。与法律或理念不同，认为和年老的父母同居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家庭意识（文化的限制性）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现实情况是，在这个社会过渡期中，人们在作为意识的三代同堂和作为实情的单身居住之间，以及直系家庭的理念和原子家庭的实情之间，进行着自我选择，自我编排。

和日本团地相似的公营高层集合住宅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是，类似的有限空间中是如何布置的，另外，居住在这里面的人们进行着怎样的生活实践，都因文化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异。¹⁹ 例如，电动洗衣机在日本住宅内多放置于浴室的脱衣间，而韩国没有相当于脱衣间的空间，则多放于阳台或者被称为多用途间的小房间里，另外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多是将洗衣机嵌套在厨房的系统厨具中。²⁰ 因此，这次的展出，虽然是对日本人来说常见而理所当然的小区生活，也希望观众能怀着这种异文化比较的视角进行观察。

4. 日常化的生活方式——清洁卫生的生活的实现

以解决都市劳动者的住宅难问题为主要目的公团住宅，在建设之初就计划标准配备室内浴室，以便人们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后，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能伸展四肢的浴室里洗浴。并且，当时普及率还只有都市人口 4% 多的抽水马桶，也在公团住宅中标准配备了。设计理念中还设置了可将就寝场所和饮食场所分离的 DK 间，这来源于人们觉得吃饭睡觉兼用“不卫生”的想法。此外，从不锈钢水槽、厨房换气扇，卫生洗脸台（盥洗组合），直到窗框，日本住宅公团都以同样的考量标准企划和开发，并通过规格化和量产化成功实现了低成本控制，而这些设计也向一般的民间住宅普及开来。²¹ 就这样，清洁卫生的生活便成为了日常，被日本人所共有，理所当然地，融入到身体的一部分里面了。

据登载在昭和 37 年（1962）版白皮书的图 7 显示的粪尿处理的状况可知，当年使用非水洗厕所的人口仍然占到八成，粪尿多是返给农村或是投入大海。具有完备的水洗厕所和浴室的住宅团地，体现了人们心向往之的“清洁卫生”的生活环境。日本的自来水普及开始于 1955 年（昭和 30），当时都市普及率不足 60%，农村不足 9%，下水道的普及则是更以后的事情了，可见日本的卫生状况曾非常糟糕。另外，在当时全国各地的岛屿地区，很多地方每人每天用水量是三升（约合 5.4 公升）²²，从水井中打水便成为妇女沉重的体力劳动负担。²³ 与此相对，公团住宅最初使用的水洗厕所冲洗一次用水量为 13 公升，也就是说冲一次厕所便够当时岛屿地区的两个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了（现在东京都每人每天的生活用水量为 240 公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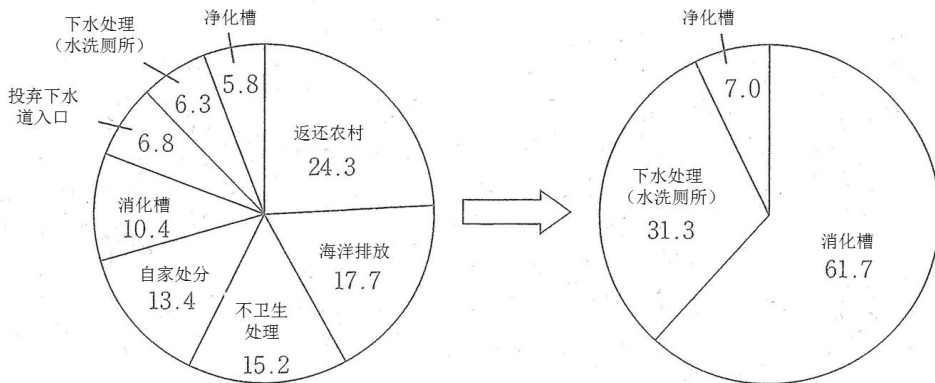


图7 粪尿处理的现状和目标
（出处）昭和37年版《厚生白皮书》

都市型生活和水、电、煤气的稳定而大量的供给是密不可分的，由此，大都市的生活基础设施也得到了迅速的修建和完善。农村地区在 1957 年（昭和 32）施行了自来水法以后，各地铺设了简易的自来水道。因上下下水道的铺设以及卫生环境的迅速改善，霍乱、赤痢和伤寒这样的感染症以及胃肠炎这样的消化道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骤减，疾病结构也发生了质的改变。²⁴ 当然，这个结构的转变，除了卫生环境的改善，与医疗技术的长足进步也不无关系，由此，基本上因病去世的年轻人大大减少，伴随着高龄化社会的进展，高龄人的死亡比例则增加，由此也带来了死亡病因的变化。

1920 年之前，日本因霍乱死亡的人数曾一度达到千人的规模。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无法控制赤痢或伤寒的流行，特别是在人口大量集中乱开发现象严重的都市地区尤为严重，到 1950 年代前期，赤痢的死亡的人数也再次超过了一万人，成为都市问题之一。这些疾病主要是由粪尿的不卫生处理导致的，而随着上下水道的建设和完善以及水洗化比例的提高，公共卫生得到彻底落实，罹患这些疾病的人数也急剧地减少。此后，癌症（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等的死因排到了前面。另外，从死亡人数的各年龄层的比例来看，在 1938 年（昭和 13）左右之前，0 岁到 4 岁死亡的乳幼儿占到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到 1950 年代仍占到二成以上。一般认为都道府县的上水道普及率和乳儿死亡率密切相关，随着水洗化和净化槽的普及，乳儿死

亡率锐减，而其降低也延长了日本人平均寿命。可以说，日本成为世界最长寿的社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实现了这种“清洁卫生的生活”。

以前的日本住宅中，人们通常将会产生烟臭味的厨台摆放在与室外空气相通的角落。DK间则让主妇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角，不但如此，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革。电器的引入打着“创造余暇”的口号，大量宣传可以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然而事实上，家庭妇女们在家务上所花费的时间却有增无减。²⁵以“加强食品卫生”为目的而引入的电冰箱，不仅减少了食物中毒类的疾病，同时也刺激了家庭用冷冻食品的开发。而随着冰箱的大型化、多功能化发展，以前只能在外面的餐馆吃得到的美味，如今也可以在自家餐桌上品尝得到，家庭菜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职主妇不得不每天亲手做菜，并且需要时时准备大量不同的菜品。洗衣机的引入，也增加了家庭洗衣的频度，每天为丈夫和孩子准备好白衬衫和内衣成为全职主妇的日常任务。这样，家庭的家电化，也导致了性别分工的强化，在促进了职业女性进入社会的同时，也让全职主妇专心于家务和育儿，加深了两极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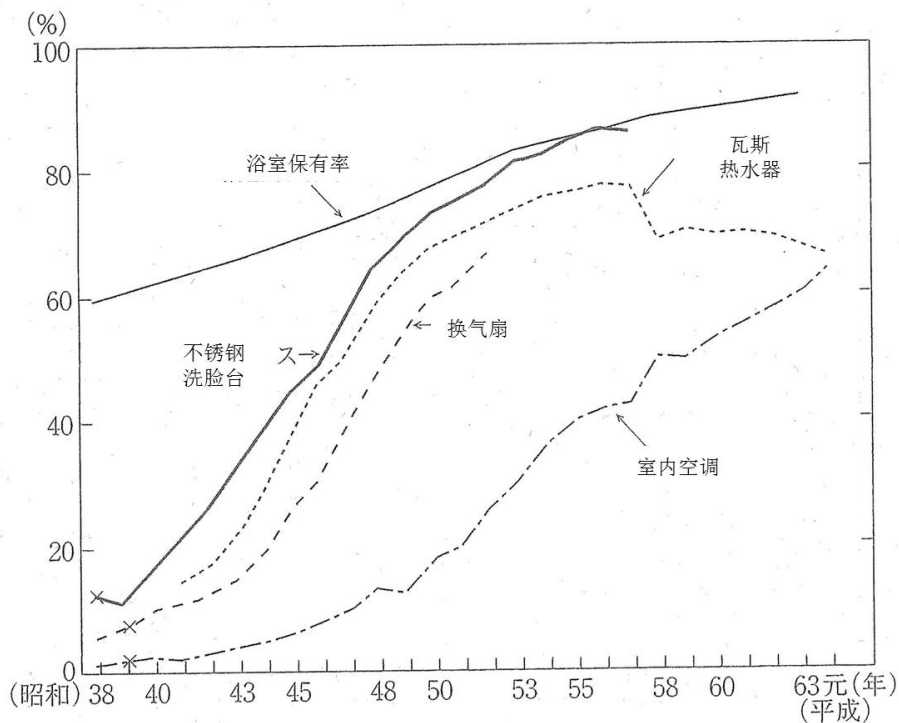


图8 主要的住宅设备的普及率的演变

(备注) 1 根据总务厅“住宅统计调查”，经济企划厅“消费和储蓄的动向”，“消费动向调查”制作。

2 ×记号以前是人口五万人以上的都市户，×记号以后是全部住户的值。

3 室内空调只包括47年以前的室内冷气扇。

(出处) 平成2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

有关日常化的事象中，有一个人们很容易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公团住宅采用降低成本的铝制

窗框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铝制窗框并不是进口技术，而是从以前的日本家庭住宅就已经使用的双槽拉门中研发出的。以前的日本房屋风会从窗缝里灌进来，随着密闭性良好的铝制窗框的普及，冬季的屋内变身成了暖房。在室内还要穿一层又一层衣服，裹着厚厚的和式棉袍的景象，恐怕已经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了。窗框的引入，再加上冷气扇（房间空调）的进一步普及，使得日本人已经不怎么打开窗户了²⁶，同时如扫地出门、跪着抹地板等打扫卫生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同样，和椅子相比，当时比较昂贵的客厅餐桌也由于日本住宅公团的标准配备一时之间变得廉价，需求量大量上升²⁷，进而全面进入到了日本人的生活中。由此，坐在椅子上吃饭的方式也普及开来，如今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在从前，无论是用箱膳还是矮脚餐桌，坐在地板上吃饭才是日本的饮食习惯。以前不管是用炭炉和灶来做饭，还是洗衣时，都是端坐在地板上或采用蹲着的姿势。而现在如同洋式厕所代表的站立或坐在椅子上的姿势正融入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的行为举止，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了。

如此，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或周遭琐碎的事物都有其历史（意义或功能的变化）。为了更好地改善我们的生活，不应该停滞于“我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放弃思考，必须对它们抱有兴趣，重新看待。²⁸可以说这也正是民俗学存在的意义和基本理念。

原注

- 1 拙稿「都市憧憬とフォークロリズム——総説」（新谷尚紀・岩本通弥編『都市の暮らしの民俗学①』吉川弘文館、2006年）、金子淳「博物館の「危機」と歴史展示——懐かしい系/ロマン系展示から見る歴史博物館の課題」（『歴史学研究』838号、2008年）。
- 2 以德国为首的欧洲民俗学，在1980年以后将研究对象和课题定为普通人的“日常（alltag）”。
- 3 1970年召开的德国民俗学会法尔肯斯坦年会上通过的定义。Wolfgang Brückner (Hg.), Falkensteiner Protokolle, Frankfurt am Main, 1971, S. 303.
- 4 拙稿「家族といのち——家族内殺人をめぐるフォークロア」（新谷尚紀・岩本通弥編『都市の暮らしの民俗学③』吉川弘文館、2006年）、「都市化に伴う家族の変容」（沢山美果子・岩上真珠・立山徳子・赤川学・岩本通弥『家族はどこへ行く』青弓社、2007年）。
- 5 昭和37年版白皮书中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如“rehabilitation（康复）”、“recreation（消遣）”、“都市贫民街”等用语首次出现或作为项目。rehabilitation含有让有障碍的劳动力重回劳动前线的意思，以前被称为余暇和娱乐的recreation，也被赋予劳动中心主义式的意义，另外“都市贫民街”是在为迎接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际欲将尚未开垦的地域一扫而光的概念，有关这些还待日后深入分析。
- 6 落合惠美子『21世紀家族へ（第3版）』（有斐閣、2004年）56頁。
- 7 如图3示，受到富国强兵的人口增强政策影响，出生率在开国后有所增加，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产儿调整运动的展开，转向了减少的倾向。人口粮食问题调查会是1927年（昭和2）由田中义一内阁设置的，1920年（大正9）年首次实施的人口普查中，查明了殖民地等外地人口和其增加率，由此从抑制政策转向了增加政策。1930年（昭和5）该调查会的汇报书中提出了“有关人口统管的诸对策”，起草这份汇报书的当时的经济学家永井亨提出“人口统管A方案”中说道：“必须要向国民宣导，一家两子的习惯只会导致人口稀少、民族的衰退命运”（《人口粮食问题调查会人口部汇报说明》1930年，40頁）。特别是有着“多生孩子多繁衍”口号的人口增加政策，是以1940年（昭和15）公布的“国民优性法”和次月内阁会议通过的“人口政策确立纲要”为基础的。后者的“宗旨”是：“建设东亚共荣圈”时，“我国人口的

- 急劇并永续地增加”“以确保在东亚的指导地位……为万分紧要之事宜”（厚生省人口局《我国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确立纲要》，1941年，22页）。其采用的措施是制定一些列的数值目标，如让适婚年龄提前3年，并让一对夫妇平均生子数达到5人。有关这些内容可以参考荻野美穂『「家族計画」への道』（岩波書店、2008年）。
- 8 Irene B. Taeuber『日本の人口』（毎日新聞社人口問題調査会、1964年）36頁、Thomas C. Smith, Nakahara: Family farming and Population in a Japanese village, 1717-1830, Stanford, 1977, pp.39-40 S. B. Hunley, K. Yamamura『前工業化期日本の経済と人口』（ミネルヴァ書房、1982年）189頁。
- 9 Alan Macfarlane『イギリスと日本——マルサスの罫から近代の飛躍』（新曜社<船曳建夫監訳>、2001年）。
- 10 柳田国男在13岁的时候离开故乡播磨，移居到茨城县的布川，对近邻人家的“二儿制”感到非常惊讶，他在德满寺地藏堂的绘马上写下了恐惧的话语，也许自己也会被掐死，这个轶事很有名。（「故郷七十年」『定本柳田国男集』別巻3、20-21頁）从强调直系性的东日本的家族体系来看，二儿制是非常合理的。（拙稿「民俗学からみた新生殖技術とオヤコ——「家」族と血縁重視という言説をめぐって」比較家族史学会監修、大田素子・森謙二編『<いのち>と家族——生殖技術と家族I』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6年）。
- 11 山下晋司『バリ——観光人類学のレッスン』（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 12 石田博英・高野善一郎『結婚新体制』（青磁社、1941年）7頁。
- 13 加藤和俊『集団就職の時代——高度成長のにない手たち』（青木書店、1997年）。
- 14 平成2年国民生活白皮書以及统计局『平成二十年住宅・土地統計調査のはなし』。
- 15 平成2年国民生活白皮書以及统计局『平成二十年住宅・土地統計調査のはなし』。
- 16 生活科学調査会編『団地のすべて』（医歯薬出版、1963年）。
- 17 布野修司「nLDKの誕生——近代日本の都市住宅事情」（新谷尚紀・岩本通弥編『都市の暮らしの民俗学③』吉川弘文館、2006年）。
- 18 家庭成员小规模化，家庭结构变得简单，家庭内杀人也会减少。从被害人、加害人的关系性这个层面来看，由非家庭成员引发的杀人案件数在昭和30年代达到顶峰后便开始锐减，从而显得家庭内杀人的比例在增加，所以才会产生家庭内杀人在增加这种言论（主观的历史）。
- 19 Miller, Daniel, Appropriation of the State on the Council Estate, Man, 23, 1988. Appadurai, Arjun.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1987.
- 20 森明子「洗濯機以前と以降——ドイツの洗濯と清潔」（近藤雅樹編『日常品の二〇世紀』ドメス出版、2003年）266-268頁。
- 21 『公団住宅仕上材料の変遷——内外装材・住宅部品の変遷と保全技術について』（住宅・都市整備公団建築技術試験場、1997年）。
- 22 宮本常一『日本の離島第1集（宮本常一著作集4）』（未来社、1969年）「付録6島の水道状況」。
- 23 拙稿「家族・親族」（『佐渡相川の歴史・民俗編2』相川町、1986年）。
- 24 前田裕子『水洗トイレの産業史——20世紀日本の見えざるイノベーショ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8年）。另外，围绕这个时期的下水道铺设人们的文化反应，详细可以参考重信幸彦「水と菌——都市伝説という方法に向けて」（佐藤健二編『都市の読解力』勁草書房）。
- 25 NHK放送出版協会編『図説 日本人の生活時間1990』（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2年）。
- 26 渡辺光雄『窓を開けなくなった日本人——住まい方の変化六〇年』（農山漁村文化協会、2008年）。
- 27 UR技術、成本管理室設備計画团队『時代との新たな対話をもとめて——UR都市機構の住宅設備の変遷と技術開発』独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1993年。

28 柳田國男「民間伝承論」（『柳田國男全集』28卷、筑摩書房、1990年）328頁。

*有关赤羽台团地的调查报告，可参阅『团地ライフ——「桐ヶ丘」「赤羽台」団地の住まいと住まい方』（北区飛鳥山博物館、2003年）、日本女子大学大学院家政学研究科住居学専攻篠原聡子研究室編『赤羽台団地1960-2007』（2007年）、岩本通弥・松前もゆる・門田岳久編『団地暮らしの人類学——赤羽台団地』（東京大学人類学教室、2010年）。

译注

- ① 团地：日本有计划集中建设的住宅区，相当于中国城市里的高层小区、新村。本文翻译中使用日语原文“团地”。
- ② 厚生白皮书：厚生省发布的报告书。2001年中央省厅再编，把厚生省与劳动省合并为厚生劳动省。日本的医疗、劳动政策、社会保险、公积金、旧的陆军省和海军省的残留的行政都是厚生劳动省所负责的。
- ③ 省厅：日本的行政机关，相当于中国的“部”和“厅”。
- ④ 丙午年：源于中国历法和阴阳学，在日本民间流传着丙午年出生的女性是克夫星的俗信。所以一般每逢丙午年出生率很低。另外，日本于明治6年（1873）起废除阴历改用阳历。
- ⑤ 日本传统社会的家族制度中，家产都由嫡系长子继承，家族分为本家（嫡系）和分家（旁系），整个家族以本家为中心，分家拥护本家的形式进行广泛的互助。